



人文齐鲁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3-14

齐鲁晚报
2022年1月20日
星期四

阅
人
文
知
齐
鲁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李皓冰



□冬华

乾隆赏赐前朝文物

曲阜是孔子故里，古代帝王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崇，有的会亲自到曲阜孔庙进行祭祀，有的则会派遣官员到曲阜祭祀。汉高祖刘邦经过山东时，“以太牢祠焉。诸侯卿相至，常先谒然后从政”，首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。据统计，历史上有十二位皇帝二十次亲临曲阜祭祀孔子。

在祭祀仪式中，礼器是必不可少的器物。因此，孔府、孔庙收藏了很多珍贵的祭祀礼器。其中最为传奇的，莫过于乾隆皇帝第五次亲到曲阜祭孔时赏赐的“商周十供”了。

乾隆皇帝自幼饱读四书五经，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，并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施政指导。根据孔府档案记载，乾隆皇帝一生八次亲至曲阜祭孔，其中三次是南巡途中经过曲阜，五次是专门到曲阜祭孔、观瞻泰山。

在赏赐“商周十供”之前，乾隆皇帝已经四次赴曲阜祭祀孔子，在历代皇帝中史无前例。

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三月，乾隆皇帝巡视天津。当时，山东巡抚富明安专程前往觐见，奏称“山左臣民望幸情殷”，请求他巡幸山东。乾隆皇帝想了想，发现自己已将近十年没有去曲阜拜谒孔庙了，此时，泰安的岱庙及碧霞宫修缮工作即将完成，次年又逢太后八旬寿诞，太后有意前往泰山上香祈福。因此，山东之行便顺理成章，乾隆帝当面允诺了次年东巡的请求。

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二月，乾隆皇帝如约来到曲阜。他这次出行非同往常，不但场面宏大，而且还带着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一同前来，因此祭孔大典较往年更为隆重。曲阜大路两旁修建了接驾亭，搭起了戏台。当时的衍圣公是孔昭焕，他率领所属官员、族人一百多人，庙户二百多人一起出城远迎。

随后，乾隆皇帝来到孔庙，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大典。乾隆皇帝向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，又命大学士于敏中祭祀了崇圣祠。乾隆看到孔庙中所陈列的祭祀礼器多为汉朝所造，认为不足以显示孔子的“帝师”身份，便下令将内务府收藏的十件商周铜器，一股脑打包赐给了孔府，用以“供列庙庭”。

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、光彩夺目的时期，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制作精良，纹饰图案丰富多彩，后世望尘莫及。乾隆皇帝赏赐的“商周十供”铸造于商周时期，形制素朴，纹饰精美，古色古香。有的布满了凝重的绿锈，有的间以暗色的红斑，有的铸有铭文。器物皆配以精雕的木座，篆刻“乾隆御赏”四字，有的还补以细镂的顶盖，盖上嵌以玲珑的玉钮。

祭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加之古代交通不便，路途遥远，导致时间成本大增。这次曲阜祭孔，自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三日启程，至四月初七日回到北京，往返共用时64天。

从清宫秘藏到孔府至宝 商周十供：

曲阜孔子博物馆里，珍藏着一套古老的祭器。它们是伯彝、蟠夔敦、木鼎、亚尊、夔凤豆、牺尊、饗饗觚、四足鬲、宝簋、册卣，通称为“商周十供”。这些文物是由清乾隆皇帝赏赐给曲阜孔庙的礼器，尽管被好生珍藏，却仍经历了诸多风风雨雨。

重大场合才被请出

实际上，乾隆皇帝除了给曲阜孔庙此等赏赐外，还曾经给国子监文庙、热河文庙也赏赐过成套的周代青铜器。

位于北京的国子监文庙于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落成，乾隆皇帝从内务府内府精选了十件周代铜器，用作祭祀仪式的陈设。这十件器物分别是素洗、牺尊、康侯鼎、内言卣、子爵、雷纹觚、雷纹壶、召中簋、牺首鬯、明簋。

乾隆四十四年(1779年)，位于河北承德的热河文庙落成，乾隆皇帝又颁赐十件周代铜器，分别是素洗、宝尊、文王鼎、夔凤卣、雷纹爵、雷纹觚、蟠夔壶、叔朕簋、蟠夔鼎、蝉纹簋。

连同曲阜孔庙“商周十供”在内的这三组成套周代青铜器，原是放在清廷内务府中由皇室使用的，即便在清朝也是非常珍贵的宝物。乾隆皇帝如此大方，一方面是彰显孔子的从周之志，认为除了商周古物外，其他时期的器物无法匹配孔子的身份；另一方面也是他尊奉孔子、推崇儒学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。

曲阜孔氏后人以御赐“商周十供”为无上光荣。这批青铜器经由北京运抵曲阜后，衍圣公孔昭焕“恭迎祇聆，具折叩谢，敬藏礼器库内，祭祀恭陈于殿中”，多年来敬谨收藏，秘不示人，只有重大祭祀活动时才将其请出。

祭祀孔子是衍圣公最重要的职责，孔府每年各种祭祀活动多达数十次，其中最隆重的是“四大丁祭”。“丁祭”的时间是在每年夏历春夏秋冬四季中的第二个月份，即二月、五月、八月、十一月这四个月月上旬的丁日。每到这天，孔府要用高规格的释奠礼祭祀孔子，其中又以春秋两季的“丁祭”最为隆重。为表示对“商周十供”的珍视，在清朝，每年只在春秋两次“丁祭”之时，“商周十供”才会被请出恭陈于孔庙大成殿中。

不过到了民国初年，情况有所变化。作为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回应，康有为、陈焕章等人组建“孔教会”，发起国教运动。他们将之前并不十分受重视的孔子诞辰日(即夏历八月二十七日)定为“大成节”。“孔教会”在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会将“商周十供”请出，以壮声势。

在平时，“商周十供”被珍藏于曲阜孔庙礼器库内。礼器库位于孔庙东路诗礼堂东庑，是专门用来存放祭祀礼器的地方，与之相对的还有孔庙西路金丝堂西庑的乐器库，专门用来存放祭祀乐器。不过，衍圣公可能认为孔庙不够安全，后来又“将‘商周十供’转移到孔府内，放到了自己眼皮子底下”。

除了重大祭祀场合外，得到衍圣公同意后，个别社会名流有机会到孔府里欣赏一下国宝，他们纷纷惊叹于“商周十供”的古朴雅致。

此后，“商周十供”的身影出现在不少书籍之中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的《曲阜县志》、道光年间冯云鹏的金石著作《金石索》、光绪十三年(1887年)衍圣公孔令贻重刊编辑祭孔车服礼器、典章制度的《圣门礼志》，均将“商周十供”原样摹绘，全部收录。如今，孔子博物馆收藏有一套1911年时由王绍寅所绘的《圣庙十供图》，画工技艺高超，图像惟妙惟肖。

晚清民国时期，随着照相技术的传播与普及，不少人又为“商周十供”摄制照片。1934年，李经野等人纂修的《续修曲阜县志》，收录了“商周十供”的照片，作为曲阜的代表性文物向世人展示。1926年，日本人马场春吉受日本外务省派遣，到山东从事秘密活动，搜集各种情报，他广泛游历曲阜、邹城等地，拍摄大量照片，编著《孔孟圣迹图鉴》(日文版)一书，该书也将“商周十供”照片收录其中。

此外，为满足民众的猎奇心理，民国时期一些报刊也纷纷登载“商周十供”照片，“商周十供”由此得到更广泛的传播。

200年间命运多舛

“商周十供”在200余年里，历尽艰险，屡遭天灾人祸。

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十二月，孔府遭遇“回禄灾”，回禄是传说中的火神，回禄灾就是火灾。据1949年以前曾在孔府工作过的孔繁银回忆，这起火灾的起因，是住在后西楼上的衍圣公孔令贻的舅母晚上不慎将蚊帐点着导致。

孔府等级森严，内宅更是绝对封闭的空间。后堂楼院包括后堂楼、后东楼及后西楼，与西侧的佛堂楼及南面的前堂楼院相连，向来是孔府女眷的住所，属于男士止步的区域。火灾发生后，后堂楼除了夫人、小姐就是丫环、女仆，根本无力救火，火势越烧越猛。据孔氏后人回忆，这场大火最终烧了三天三夜，七座楼房都化为了灰烬。

“商周十供”当时就收藏在前堂楼，处境十分危险。所幸衍圣公孔令贻喜欢京剧，此时正好有戏班在孔府，孔令贻连忙让戏班的武生翻跟头上楼，从火中抢出了“商周十供”，稀世国宝这才幸免于难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进程，次年1月，日军占领了曲阜。为防止末代衍圣公、奉祀官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被其利用，国民政府提前安排孔德成转移南下，离开了曲阜。临行前，孔德成将家族事务交给孔府近支孔令煜主持。

日寇对“商周十供”觊觎已久，多次派人到孔府索要“商周十供”，孔令煜答复说“商周十供”已经在孔德成南下时被带走，没在孔府。日寇表面打着尊孔旗号，有时也到孔庙献香行礼，不敢到孔府强行翻查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实际上，当时“商周十供”就埋藏在孔府的后堂楼地下，国宝又幸运地躲过一劫。

1948年，正值解放战争时期，孔府将“商周十供”及其他文物打包运至兖州暂存，准备进一步通过铁路运往南方。由于解放军很快围城兖州，切断了南段铁路，并解放兖州城，这批文物被全部查获。据说，在战争中，国民党飞机投弹烧毁了“商周十供”木箱边沿一角，所幸国宝没有被彻底毁于战火。

这批被查获的文物共有50箱，经接收机关移交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别后分别处置，其中的“商周十供”由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直接保管。济南解放后，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迁至济南，曾在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内举办古物展览，“商周十供”作为重要文物对外展出。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，为保障安全，“商周十供”一度保存在济南千佛山的石洞中。1955年，“商周十供”终于重新运回家乡曲阜，交由曲阜文管会保管。为了更好地保护孔府旧藏文物与档案，相关部门在孔府东侧建设了孔府文物档案馆，1994年正式启用，“商周十供”得以入藏库房安享太平。

2018年11月26日，全新的孔子博物馆开馆试运行。“商周十供”作为首批重点文物入藏并上展，保存和展览环境得到极大改善。至此，国家一级文物、200多年来秘不示人的孔府重宝“商周十供”终于与世人公开见面。